

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 其「義例」之見解研究

鄭 卜 五*

提 要

劉逢祿（申受）生平著作頗豐，其撰述春秋學之書者，有十幾種，劉逢祿治公羊學本於篤好董、何之書，為之探源闡揚，且專興何休一家之言，著有《公羊何氏釋例》、《何氏解詁箋》、《發墨守評》、《穀梁廢疾申何》與《論語述何》，凡何氏所謂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」，如「張三世」、「通三統」、「紂周王魯」、「受命改制」諸義，劉逢祿皆次第發明其意。

劉逢祿又以「辨左氏乃史，穀梁不傳微言」，斥責《左氏春秋》乃如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一類，非專為傳《春秋》者，即是司馬遷《史記》所謂的「左氏春秋」是其舊名，而名為「春秋左氏傳」者，實出於劉歆的偽改。劉逢祿治《春秋》獨尊《公羊傳》，並據《公羊傳》之微言大義以兼說諸經，常州公羊學派自此始明白樹立。劉逢祿雖未排斥古文，然其重視家法條例風格，卻已開啟後世「尊今文之有家法，斥古文之無師傳」的端倪。

劉逢祿誓志「治《春秋》今文之學，有志發揮成一家言」，更推衍《公羊》要義，遵崇董仲舒，發揚何休之緒，其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一書最具代表性。就其內容而言，以重

*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

振董、何《公羊》三科九旨之學，歸納何氏條例，以通《春秋》之旨，更使公羊義例幽而復明，以探求西漢微言大義之所在，欲追尋七十子之所遺，繼聖人之統紀，並以之通貫群經，決疑斷史。

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十卷是劉逢祿《春秋》學理論最完整的體現。劉逢祿言撰作此書的動機，在於全面恢復董仲舒、何休之學。因此本文以「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其『義例』之見解」為研究核心，探討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中，如何闡揚何休《公羊》「義例」之具體見解，及其歸納《公羊》「義例」之明確論據，並且論述劉逢祿對何休《公羊》「義例」的闡發，以探究劉逢祿闡釋何休『義例』之「見解」的得失及其對公羊學的貢獻。

關鍵字：劉逢祿、何休、春秋、公羊、義例、三科九旨、今文經學

劉逢祿（1776～1829），字申受，一字申甫，號思謨居士，武進人，大學士劉綸之孫。嘉慶十九年甲戌進士（1814）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官禮部主事，常以經義決疑事，為時人所推崇。活動在於乾隆、嘉慶朝皆二十多年之久，道光九年卒於官，享年五十四。劉逢祿為莊存與之外孫，隨舅父莊述祖習《公羊》學，盡得外家之傳。劉逢祿嘗謂曰：「諸經中知類通達，微顯闡幽者，厥為《公羊》一書，董仲舒之所傳，何邵公之所釋，微言大義一髮千鈞」。

於是劉逢祿覃思於董仲舒之學，探研於何休之注，「尋其條貫，正其統紀」，撰有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十卷，又析其疑滯闡其旨義為《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》一卷、《論語述何》二卷、《答難》二卷、《發墨守評》一卷，又推勘左氏及穀梁之得失，作《左氏春秋考證》一卷、《箴膏肓評》一卷、《穀梁廢疾申何》二卷、《緯略》一卷、《議禮決獄》二卷、《春秋賞罰格》二卷，舉凡春秋學之作十幾種，雖非專論《春秋》之作，但發揮何休之學說者甚多。又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，有何、虞、許、鄭四人，乃擷拾殘篇撰《今古文尚書集解》二十卷、《書序述問》一卷，《詩聲衍》二十七卷、《條例》一卷、又仿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例以存異文古訓，撰《五經考異》，先成《易》一卷、《春秋論》一卷、又取天官書及廿二史劄記《疏證》二卷，其他著作尚有《毛詩譜》三卷、《詩說》二卷、《石渠體議》一卷、《庚辰大禮記長編》十二卷、《春闈雜錄》一卷、《東陵勘地圖說》一卷，又編輯《八代文苑》四十卷、《唐詩選》四十卷、《絕妙好詞》二十卷、《詞雅》五卷，皆藏於家，所著詩文有《劉禮部集》十二卷，可謂著作等身。

劉逢祿不僅著作豐富，且能在見解及方法上推陳出新，與時俱進，極具個人學術特色。就其著作而言，有關《春秋》公羊學的專書或專文，多達十餘種，其它散論之文字，仍有很多，可見劉氏對公羊學之探究不遺餘力，其中尤以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最具代表性。就其內容而言，以重振董、何《公羊》三科九旨之學，歸納何氏條例，以通《春秋》之旨，進而推衍孔子編作六經之義，將《公羊》大義衍成清代經今文學「經典釋義公羊化」之學術風潮，以奠定清代常州公羊學風格。

劉逢祿雖推崇董仲舒及何休，然而對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並無發揮，卻在何休的《解詁》上重新加以發皇。劉氏標舉何休的「三科九旨」，作為「微言大義」的準據。

劉氏的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十卷，歸納何休「義例」，分成三十類，把何休的「三科九旨」、宋氏的「三科九旨」都概括進去，是以兼容並蓄的集大成態度，來發揮何休釋《公羊》之旨。

至於「內外」的議題在滿清帝國的統治下，仍是劉逢祿所必須處理的問題，他從文化及政治上的考量。其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完成於（1805）嘉慶初年，為了符合當時的狀況，

他說：「余覽春秋進黜吳、楚之末，未嘗不歎聖人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。……慨然深思其故，曰：中國亦新夷狄也。」劉逢祿體認了衰亂的中國一如「新夷狄」，他所重視的是對未來的關懷，所期盼的是對未來的規劃，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云：「余觀春秋……深探其本，皆詳內以略外……形勢雖強，要以仁義為本，允哉！」他注重現況的改革「要以仁義為本」，來作為興革的準則。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又曰：「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；用乾坤之義，以述殷道；用夏時之等，以觀夏道。等之不著，義將安放？故分十二世以為三等。……由是辨內外之治、明王化之漸、施詳略之文」。

劉逢祿標舉孔子作《春秋》是「為萬世制法」，故其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云：「夫用聖人者天也，天不欲孔子救東周之亂，而命以春秋救萬世之亂」，可見《公羊》的「三世」義在清代中葉，是付以「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」的詮釋，劉逢祿使滿清的統治地位合理化，並聖化了孔子為萬世制法的論調。孫春在於《清末的公羊思想》中認為：「他（劉逢祿）在何休的模式裡加上合乎時代需要的解釋，一方面符合了經學講究『家法』的標準，另一方面也不致與當時的考證之風衝突太大。」劉逢祿尊奉何休「義例」為釋解《公羊》之準則，其風氣漫延至今日而不息。

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·自序》云：「學者莫不求知聖人，聖人之道備乎五經，而春秋者，五經之筭鑰也，先漢師儒略皆亡闕，惟詩毛氏，禮鄭氏，易虞氏，有『義例』可說，而撥亂反正，莫近《春秋》」。

然錢大昕〈春秋論〉之一則認為：「《春秋》褒善貶惡之書也。其褒貶奈何？直書其事，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。曰崩，曰薨，曰卒，曰死，以其位為之等。《春秋》之例，書崩，書薨，書卒，而不書死。死者，庶人之稱，庶人不得見於史，故未有書死者。此古今史家之通例，非褒貶之所在，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」（《潛研堂文集》卷二）。錢大昕則認為史家記事本有通例，《春秋》依魯國史記，非聖人發凡之「義例」，然劉氏則深信《春秋》之中有「義例」存在。《春秋》之中是否有「義例」存在？何邵公標舉《春秋》「義例」之說是否允當？或謂《春秋》無達辭，則「義例」之其意義何在？都是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待解決的問題。至於「義例」的闡明對清代經今文學之影響為何？晚清經今文學興起之速其原由，是否也與《公羊》「義例」之闡揚有關？都是尚待探討的問題。

劉逢祿所認知之《春秋》，實《公羊》傳及董、何之《春秋》學，故其論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之失，難免於門戶之見，重啟今古文之爭論。劉氏亦尋何休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」，其中難脫曲說附會，比附牽強之病，然其探原抉微，宏揚聖學之道，其所準裁者，有其一定的時代意義。就整體觀之劉逢祿能緣舊學以開新局，所論雖不無小疵，亦瑕不掩瑜，其表現與

成就，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。

本文以「劉逢祿闡釋何休『義例』之見解」為核心，以探討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中，如何闡揚何休《公羊》「義例」之具體見解，及歸納《公羊》「義例」之明確論據？就其致用而言，劉氏如何藉用公羊學微言之法，發揮經世之志，宣揚大一統思想？如何闡發三科九旨之時代意義，用以鞏固統治者之政權地位？在其研究方法上而言，劉氏如何博採證據，條分縷析，駁斥劉歆緣經飾說偽纂《左傳》之妄，以推原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之價值得失？又如何開啟經今文家辨偽古文經真假之風氣？皆是有待釐清的關鍵。

本文旨在探索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中，有關《公羊》「義例」的三十種命題的研究，做分門別類的整理，以歸納其要旨與論據。本文的撰寫，將兼重「論據歸納的分析」與「問題論議的比較」作探析，針對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中，有關何休《公羊》「義例」的闡釋作研究，將述其精要，釐其奧義，論其得失，辨其是非，以考察何休《公羊》「義例」的獨特見解與繆誤缺失之所在，並且論述劉逢祿對何休《公羊》「義例」的闡發，以探究劉逢祿之「見解」之得失及其對公羊學的貢獻。

一、劉逢祿：獨尊《公羊》，專興何休

劉逢祿對於各種經典都有深湛的研究，據他的兒子劉承寬說：

大抵府君於《詩》、《書》大義及六書小學，多出於外家莊氏，《易》、《禮》多出於臬文張氏，至《春秋》則獨抱遺經，自發神悟。

雖是如此，劉逢祿青年時代既以莊述祖為師，則在公羊學上，不能不受莊存與、莊述祖的影響。他自述對《公羊》學的興趣時說：「祿束髮受經，善董生、何氏之書，若合等節」¹，劉逢祿對董仲舒、何休之書，他似乎情有獨鍾，他說：「余自童子時，癖嗜二君之書，若出天性」²，這種自幼即產生的對《公羊》的興趣，很難說不與其外家莊存與的學統有密切關係。

劉逢祿為學博通群經，又承乾嘉章句訓詁的樸學之後，使他對於漢學的探研，有其獨特的見解。

¹ 參見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敘》，《皇清經解》卷一千二百八十。

² 參見劉逢祿《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》，《皇清經解》卷一千二百九十。

他所謂漢學，是指西漢、東漢而言的。他針對當時學者言漢學大多只重賈、馬、許、鄭等東漢之學的情況，他把關注的目光放在漢代的公羊學上面。在他看來，漢代的儒者，只有《公羊傳》與子夏《喪服傳》二書尚可堪稱「知類通達、微顯闡幽」，此二書能創通「大義」，闡發「微言」，而其他的經典中則僅限於訓詁象數而已。劉逢祿說：

然《喪服》於五禮特其一端，《春秋》文成數萬，其旨數千，天道淡，人事備。以之貫群經，無往不得其原；以之斷史，可以決天下之疑；以之持身治世，則先王之道可復也³。

就漢代的顯學而言，西漢之時《春秋》學應該是當時經學的核心與主幹，東漢之後雖漸褪色，然亦主導學術風潮，此正是劉逢祿所謂「《春秋》者，五經之管鑰也」⁴，一般乾嘉儒者也都很重視《春秋》，不過他們大多認為《春秋》是魯史之舊文，只是直書其事，褒貶自見，並無所謂「一字褒貶」及「義例」；當時的錢大昕、紀昀、郝懿行等人，都發表過「重《左氏》輕《春秋》」的意見。劉逢祿則認為這是對《春秋》經傳價值公然的貶低，在劉承寬《先府君行述》云：「其弊不至於等經朝報、束傳高閣不止」。

劉逢祿堅守《公羊》的立場，堅持「一字褒貶」、「三科九旨」諸說，認為這樣才能夠彰顯《春秋》之所以為「經」，而不是一般的「記事之史」。對於錢大昕的《公羊》不如《左氏》的議論，他從根本上給予反駁，劉逢祿《春秋論上》云：

吾謂此非《公羊》之不及《左氏》，乃《春秋》之不及《左氏》也。《左氏》詳於事，而《春秋》重義不重事；《左氏》不言例，而《春秋》有例無達例。惟其不重事，故存什一於千百，所不書多於所書；惟其無達例，故有貴賤不嫌同號，美惡不嫌同詞，以為待貶絕之分，以寓一見不累見之義。如第以事求《春秋》，則尚不足為《左氏》之目錄，何謂游、夏之莫贊也；如第執一例以繩《春秋》，則且不如畫一之良史，何必非斷爛之朝報也。

劉逢祿批評錢大昕沒有掌握《春秋》的精髓，只是從記事的角度看《春秋》，那不要說《公羊傳》不如《左氏》，即使《春秋》亦不如《左氏》。同時，劉逢祿認為人們也不應忽視「《春秋》無達例」的道理，如果忘記了「貴賤不嫌同號，美惡不嫌同詞」，從而根本否認《春秋》中存在著「例」，那也等於把《春秋》降格為一般的史冊。

³ 《清史列傳》卷六十九《劉逢祿傳》。

⁴ 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敘》，《皇清經解》卷一千二百八十。

劉逢祿大大拓寬了漢學範圍，在他看來，賈、馬、許、鄭固然是漢學，董仲舒、何邵公也是漢學；古文家的訓詁、小學固然是漢學，今文家的義理也是漢學；而且今文家的義理是更重要的漢學。劉逢祿認為以《春秋》學來講，復古尊漢，一定要回歸到董仲舒，回歸到何休，這才是真正的漢學。劉逢祿繼承莊存與、孔廣森之後，繼續高揭《公羊》學的大纛，在乾嘉諸儒的漢學園地裡，另辟了一條《春秋》公羊學的新道路。

劉逢祿的《公羊》學與莊存與和孔廣森都有不同，特別是與孔廣森相比較，區別則更為明顯。劉逢祿認為他是力圖恢復董仲舒、何休公羊學的原貌，而且劉逢祿認為董仲舒、何休是一體同源，是不應分別對待的。劉逢祿視董仲舒、何休為一體同源，其實是誤解了董仲舒，董仲舒之學是《春秋》學，而何休之學是《公羊》學，二者有方法及本質上的差異存在，然而劉逢祿並未看出來董仲舒、何休的差異，主要是他對《春秋繁露》的認知不夠，其批評孔廣森背離何休之說，「乃其三科九旨，不用漢儒之舊傳，而別立時月日為天道科、譏貶絕為王法科、尊親賢為人情科」，劉逢祿認為這樣《公羊傳》就與那未得《春秋》真義的《穀梁傳》無以異了。其實這種說法是拿何休的《春秋公羊解詁》做標準，凡不合者皆為出局，豈不可笑。劉逢祿認為孔廣森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歧出，劉逢祿說：

推其意，不過以據魯、新周、故宋之文疑於倍上，治平、升平、太平之例當於鑿空……

又其意以為三科之義，不見於傳文，止出何氏《解詁》，疑非《公羊》本義⁵。

劉逢祿以為「三科九旨」之說雖不見於傳文，但何休自言「依胡毋生條例」，而且在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以及《史記》的《太史公自序》、《孔子世家》中都有其說，這些都得自《公羊》先師、七十子遺說，「不特非何氏臆造，亦且非董、胡特創也」。因此，劉逢祿對何休的「三科九旨」說深信不疑，他說：「無三科九旨則無《公羊》，無《公羊》則無《春秋》」，因此在劉逢祿的著作中，對何休「三科九旨」之說是闡發的不遺餘力。

二、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之體例

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十卷是劉逢祿《春秋》學理論最完整的體現，此書共分為十卷：

⁵見劉逢祿《春秋論下》，《劉禮部集》卷三。

卷一：張三世例第一，通三統例第二，內外例第三。

卷二：時月日例第四。

卷三：名例第五，褒例第六，譏例第七。

卷四：貶例第八，誅絕例第九。

卷五：律意輕重例第十。

卷六：王魯例第十一，建始例第十二，不書例第十三，諱例第十四。

卷七：朝聘會盟例第十五，盟薨卒葬例第十六，大國卒葬表第十七，小國進黜表第十八（十四諸侯終始表第十七、十八），秦吳楚進黜表第十九（秦楚吳）。

卷八：公終始例第二十，娶歸終始例第二十一，致公例第二十二，公大夫世系表第二十三，大夫卒例第二十四。

卷九：侵伐戰國入滅取邑例第二十五，地例第二十六，郊禘例第二十七，闕疑例第二十八，主書例第二十九。

卷十：災異例第三十。

全書共有十卷，分為三十章。唯「卷二：時月日例第四」、「卷五：律意輕重例第十」及「卷十：災異例第三十」，此三卷每卷內容較多，每卷只有一章外，其餘每卷包含數章。此書主旨在於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之探討，而於每章之末，除「譏例第七」、「貶例第八」、「盟薨卒葬例第十六」、「公大夫世系表第二十三」，此四章於文末「無釋曰」外，其餘每章文末劉逢祿皆有一篇「釋曰」，來闡論該章之要義。在三十章中尚有：「名例第五」，一章中有二篇「釋曰」，分別置於文中與文末。此外「大國卒葬表第十七」、「小國進黜表第十八」二章在目錄上有其目，但在正文中合并為「十四諸侯終始表第十七、十八」與「秦吳楚進黜表第十九」正文寫為（秦楚吳進黜表），都是以「余覽《春秋》」為開頭語的敘述方式，對其章節的說釋，且於文末沒有「釋曰」，以說釋該章表列之要義。

劉逢祿認為撰作此書的動機，是要全面恢復董仲舒、何休之學。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序中對《春秋》學的歷史做了簡單的回顧，其敘曰：「昔孔子有言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又曰：知我者其維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。蓋孟子所謂：行天子之事，繼王者之跡也。」劉逢祿從孔子編撰《春秋》的職志，及孔子編撰《春秋》的用意「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」，認為孟子最能瞭解孔子編撰《春秋》的目的，是在「行天子之事，繼王者之跡也」。劉逢祿的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敘云：

傳《春秋》者，言人人殊，惟公羊氏五傳，當漢景時，乃與弟子胡毋子都等，記于竹帛。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，講明而達其用，而學大興，故其對武帝曰：「非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，皆絕之，弗使復進。」漢之吏治經術，彬彬乎近古者，董生治《春秋》倡之也。胡毋生雖著條例，而弟子遂者絕少，故其名不及董生，而其書之顯亦不及《繁露》。綿延迄于東漢之季，鄭眾、賈逵之徒，曲學阿世，扇中壘之毒焰，鼓圖讖之妖氛，幾使義轡重昏，昆侖絕紐，賴有任城何邵公氏，修學卓識，審決白黑而定，尋董、胡之緒，補莊、顏之缺，斷陳元、范升之訟，鍼明、赤之疾，研精覃思，十有七年，密若禽、墨之守禦，義勝桓、文之節制，五經之師，罕能及之。天不祐漢，晉戎亂德，儒風不振，異學爭鳴。杜預、范甯吹死灰期復然，漑朽壤使樹藝，時無戴宏，莫與辨惑，唐統中外，並立學官。自時厥後，陸淳、啖助之流，或以異置師法，燕說郢書，開無知之妄，或以和合傳義，斷根取節，生歧出之途，支室錯迕，千喙一沸，而聖人之微言大義，蓋盡晦矣。

從劉逢祿的這段敘述，可以洞見他標舉董仲舒、何休為《春秋》學的正宗傳人，可以看出他對董仲舒、何休二人的推崇。但他也感慨魏晉、唐宋以來「杜預、范甯吹死灰期復然，漑朽壤使樹藝，時無戴宏，莫與辨惑，唐統中外，並立學官」，厥後又有「陸淳、啖助之流，或以異置師法，燕說郢書，開無知之妄，或以和合傳義，斷根取節，生歧出之途」，遂使《春秋》學的微言大義已經「盡晦」不明。《春秋》公羊學的微言一直沉寂到清朝中葉，才覺醒過來。劉逢祿的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敘云：

大清之有天下百年，開獻書之路，招文學之士，以表章六經為首，于是人恥鄉壁虛造，競守漢師家法，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，欽金榜氏之于禮，其善學者也，（祿）束髮受經，善董生何氏之書，若合符節，則嘗以為學者，莫不求知聖人，聖人之道備乎五經，而《春秋》者，五經之筌鑰也。先漢師儒略皆亡闕，惟《詩》毛氏，《禮》鄭氏，《易》虞氏有義例可說，而撥亂反正，莫近《春秋》，董、何之言，受命如嚮，然則求觀聖人之志，七十子之所傳：舍是奚適焉。

劉逢祿認為清儒學風大變，「人恥鄉壁虛造，竟守漢師家法」，這正是恢復《春秋》學本來面目的時候，劉逢祿「故尋其條貫，正其統紀，為《釋例》三十篇」，劉逢祿對何休的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做了全面的說解，因此劉逢祿的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，是在劉逢祿對學術史的關懷中而誕生。

劉逢祿在其《春秋公羊何氏釋例·主書例》第二十九自述此書的撰作旨意時，云：

何氏之於經，其最密者也。既審決詖淫，判若白黑，而引伸觸類，離根散葉，貫穿周顧，網羅完具。又慮用之者輕重失倫，源委莫究，輒下宗義，以正指歸。竊嘗以為，先漢以《公羊》斷天下之疑，而專門學者，自趙董生、齊胡毋生而下，不少概見。何氏生東漢之季，獨能彙括兩家，使就繩墨，於聖人微言奧旨，推闡至密。惜其說未究於世，故竟其餘緒，為成學治經者正焉。

劉逢祿極力推崇何休，認為何休《公羊》學說最為縝密，不但「審決詖淫，判若白黑」，何休能掌握《公羊》學說的要旨，其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可謂「而引伸觸類，離根散葉，貫穿周顧，網羅完具」，更是《公羊》學說的匯聚。而何休生在東漢末年，其鑽研《公羊》學說甚深「獨能彙括兩家，使就繩墨」，又能「於聖人微言奧旨，推闡至密」，因此劉逢祿獨衷於何休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的說釋。

三、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之「義例」探究

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共三十章，有三章為「表」：《大國卒葬表》、《小國進黜表》、《秦吳楚進黜表》之外，其餘諸章都是歸納何休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中的「義例」，其名目分別為：「張三世例」、「通三統例」、「內外例」、「時月日例」、「名例」、「褒例」、「譏例」、「貶例」、「靈異例」等等。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的書寫模式為：每一章之中，都是抄撮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中有關此「例」的注文，章末附以劉逢祿之「釋」解一篇，大都是對何休之說做一些發揮或解釋的闡揚。例如：

(一) 張三世例第一

隱元年，注：所傳聞之世，外小惡不書。書者，來接內也。

傳：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。

注：所見者，謂昭、定、哀矣，與父時事也。所聞者，謂文、宣、成、襄，王父時事也。所傳聞者，謂隱、桓、莊、閔、僖，高祖、曾祖時事也。異辭者，見恩有厚薄，義有深淺，時恩衰義缺，將以理人倫，序人類，因制治亂之法，故於所見之世，恩已與父之臣尤深，大夫卒有罪，無罪皆日錄之。丙申，季孫隱如卒是也。所聞之世，王

父之臣，恩少殺大夫，卒無罪者，日錄；有罪者，不日略之，叔孫得臣卒是也。所傳聞之世，高祖、曾祖之臣恩淺，大夫卒有罪無罪皆，不日略之也，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。於所傳聞之世，見治起于衰亂之中，用必尚羸犢，故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先詳內而後治，外錄大略小，內小惡不書，大國有大夫，小國略稱人，內離會書，外離會不書是也。於所聞之世，見治升平，內諸夏而外夷狄，書外離會，小國有大夫。宣十一年秋，晉侯會狄于欒函。襄二十三年，邾婁鼻我來奔是也。至所見之世，著治太平，夷狄進至于爵，天下遠近，大小若一，用心尤深而詳，故崇仁義，譏二名，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，所以三世者，禮為父母三年，為祖父母期，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，立愛自親始，故《春秋》據哀錄隱，上治祖禰，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，取法十二公，天數備，足著治法式，又因周道始壞，絕于惠、隱之際。

桓二年。

傳：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。

注：復發傳者，益師以臣見恩，此以君見恩，嫌義異也。所見之世，臣子恩其君父尤厚，故多微詞是也。所聞之世，恩王父少殺，故立煬宮不日，武宮日是也。所傳聞之世，恩高祖、曾祖又少殺，故子赤卒不日，子般卒日是也。(按：哀十四年傳、注並同)

在「張三世例」中劉逢祿舉十六條注文，以上僅舉其中之二例，以見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的書寫模式，都是抄撮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中有關此「例」的各條注文，並列而存。或間有於條末，再加「雙行小字」按語者，如：桓二年此條末，則注曰：「按：哀十四年傳、注並同」，作為補述之用。最後於章末附以劉逢祿「釋曰」之解釋一篇，以做為發揮或解釋的闡揚。

在「張三世例第一」章之末，劉逢祿的「釋曰」，對何休的公羊「三世說」，做詳細的解釋，並說明為什麼要將「十二世」分為「三等」的原因。其「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」主要強調的「見解」是「三世義例」的分野準則：「《春秋》緣禮義以致太平：於所見微其詞，於所聞痛其禍，於所傳聞殺其恩」，由是「辨內外之治，明王化之漸，施詳略之文」。

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·張三世例第一》云：

釋曰：《傳》曰：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《春秋》緣禮義以致太平，用坤乾之義，以述殷道。用夏時之等，以觀夏道。等之不著，義將安放？故分十二世，以

為三等。

劉逢祿指出《春秋》的根柢在於「禮義」，他解釋《公羊》學所謂三世：是「《春秋》起衰亂以近升平，由升平以極太平」之過程。

有見三世，有聞四世，有傳聞五世，於所見微其詞，於所聞痛其禍，於所傳聞殺其恩，由是辨內外之治，明王化之漸，施詳略之文，魯愈微而《春秋》之化益廣，內諸夏不言，鄙疆是也。(董子〈觀德〉篇云：稻之會先內衛。〈奉本〉篇云：諸侯伐哀者，皆言我俱勝，何氏注義)⁶世愈亂，而《春秋》之文益治，譏二名，西狩獲麟，是也。

《公羊》學的三世說，並不是對歷史實際的真實描述，而只是一種理想的理論模式，而將三世分為「有見三世，有聞四世，有傳聞五世」，何休對《公羊》學三世說的「異辭」，則認為：「於所見微其詞，於所聞痛其禍，於所傳聞殺其恩，由是辨內外之治，明王化之漸，施詳略之文」，《公羊》學三世說的「異辭」旨在明白王道教化的漸次性。即所謂「魯愈微而《春秋》之化益廣」，「世愈亂而《春秋》之文益治」。劉逢祿在「張三世例第一」之「釋曰」更論及：

昔者夫子正雅南，以先公之教繫之召公，著王道之始基而騶虞為之應，以文王之風繫之周公，著王道之太平，而麟趾為之應小雅，文武為牧伯之事也，諸侯歌之。其衰也，至於四夷交中國微大雅，文武為天子之事也，天子歌之。其衰也，至於西土亡，王跡熄，鳴鳥不聞，河圖不出，天乃以麟告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。

劉逢祿認為孔子正雅南，以振周室之衰，並認為孔子「愀然以身任萬世之權，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，著萬世之治，且曰：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」，劉逢祿認為孔子是借用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的史事，為天下後世樹立法則，而刪撰成《春秋》一書。其「據亂、升平、太平」之三世說，只是何休分別用這些概念來為《春秋》作注解，何休雖缺乏系統性的論述，然而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，則給予更深切的理路說明。「張三世例第一」之「釋曰」言：

《春秋》起衰亂以近升平，由升平以極太平。尊親至，於凡有血氣，而推原終始之運。

⁶ 劉逢祿在每章末的「釋曰」中，亦有為了強調自己說釋的依據可靠性，再用「雙行小字」按語加以強調。如「張三世例第一」之「釋曰」中言「內諸夏不言，鄙疆是也」，其按語曰：「董子〈觀德〉篇云：稻之會先內衛。〈奉本〉篇云：諸侯伐哀者，皆言我俱勝，何氏注義」，劉逢祿即引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和何休之說，來証成自己的說法。

正其端曰：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。著其成曰：西狩獲麟。故曰：治不可恃，鳴隼猶獲麟也，而商正於是建矣。亂不可久，孛於東方。螽於十二月。災於戒社，京師於吳楚，猶匪風下泉也，而夏正於是建矣。無平不陂，無往不復，聖人以此見天下之心也。

劉逢祿解釋《公羊》學的「三世」過程，是以「《春秋》起衰亂以近升平，由升平以極太平」是「無平不陂，無往不復」之程序。

(二) 通三統例第二

在「通三統例」中劉逢祿舉二十條何休注文，以下僅舉其中之一例，以見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對「通三統例」的「見解」。

隱元年，春王正月。

注：王者受命，必徙居處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變犧牲，異器械，明受之于天，不受之于人。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，平旦為朔，法物見，色尚黑。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，雞鳴為朔，法物牙，色尚白。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，夜半為朔，法物萌，色尚赤。又注：禮，適夫人無子，立右媵，右媵無子，立左媵，左媵無子，立嫡姪娣，嫡姪娣無子，立右媵姪娣，右媵姪娣無子，立左媵姪娣。質家親親，先立娣，文家尊尊，先立姪。嫡子有孫而死，質家親親，先立弟，文家尊尊，先立孫，其雙生也，質家据見立先生，文家据本意立後生，皆所以防愛爭。

劉逢祿在「隱元年，春王正月」之下，舉何休「注：王者受命，必徙居處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變犧牲，異器械，明受之于天，不受之于人」。以說明「隱元年」是王者受命，必當創造新氣象，是告明百姓王者是「受之于天，不受之于人」，其實背後主要的目的，是不要使百姓「見物思情」對前朝有所依戀。何休注更舉「三統」的「正朔」「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，平旦為朔，法物見，色尚黑。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，雞鳴為朔，法物牙，色尚白。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，夜半為朔，法物萌，色尚赤」，說明「改正朔」的依據方式，何休之旨在於「通三統例」。

劉逢祿於此條下再舉何休「又曰」的補充說明，以示何休對「通三統例」的看法，「又注：禮，適夫人無子，立右媵，右媵無子，立左媵，左媵無子，立嫡姪娣，嫡姪娣無子，立右媵姪娣，右媵姪娣無子，立左媵姪娣。質家親親，先立娣，文家尊尊，先立姪。嫡子有孫

而死，質家親親，先立弟，文家尊尊，先立孫，其雙生也，質家据見立先生，文家据本意立後生，皆所以防愛爭」。何休雖然所舉是「適夫人無子」時，王位的繼承方式由「右媵、左媵、嫡姪娣、右媵姪娣、左媵姪娣」等順序，並提出所「質家親親」、「文家尊尊」的不同制度，還是在於明白的告訴百姓，已經改朝換代，制度也重新改異，其主要目的還是不要讓百姓「見物思情」對前朝有所依戀。

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對所舉的二十條何休注例，在「通三統例第二」章後，所作綜結的「釋曰」說明，有二點強調的「見解」。其一為：「新周故宋、魯當為新王」。

「釋曰」：昔顏子問為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。終之，曰：樂則韶舞。蓋以王者，必通三統，而治道乃無偏，而不舉之處，自後儒言之，則曰：「法後王」，自聖人言之，則曰：「三王之道若循環」，終則復始，窮則反本，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，不獨一姓也。夫正朔，必三而改，故《春秋》損文而用忠，文質必再而復，故《春秋》變文而從質，受命以奉天地，故首建五始。至于治定功成，鳳皇來儀，百獸率舞，而韶樂作焉。則使元終麟之道，舉而措之，萬世無難矣。曰：然則三正見于夏書，而《春秋》繼詩亡而作，詩顧不言，何也。曰：詩之言，三正者多矣，而尤莫注于三頌，夫子既降王為風，而次之邶鄘之後，言商周之既亡，終之以三頌，非新周故宋，以魯頌當夏，而為新王之明微乎。夫既以魯頌當新王，而次之周後，復以商頌，次魯而明繼夏者殷，非所謂三王之道，若循環者乎，故不明《春秋》，不可與言「五經」，《春秋》者，五經之筭鑰也。

劉逢祿強調「通三統」主要在於「三王之道若循環」，而孔子編撰《春秋》是「損文而用忠，文質必再而復，故《春秋》變文而從質，受命以奉天地，故首建五始」，劉逢祿意含著孔子「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」，更認為《春秋》是繼詩亡而作，所以不明白「通三統」的「非新周故宋，以魯頌當夏，而為新王之明微乎。夫既以魯頌當新王，而次之周後，復以商頌，次魯而明繼夏者殷，非所謂三王之道，若循環者乎」，所以不瞭解《春秋》經，就無法理解「五經」的要義，「故不明《春秋》，不可與言「五經」，《春秋》者，五經之筭鑰也」，因此《春秋》是進入「五經」的關鍵鑰匙。

在「通三統例第二」章後「釋曰」的說明，其二點強調「《春秋》之義，固上貫二帝三王，而下治萬世者也」的「見解」為：「《春秋》為萬世立法」

曰：通三統之義，既得聞命矣，子思子之述《春秋》也，則曰：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

《傳》亦曰：樂道堯舜之道。而其釋五始，則曰：王者熟謂，謂文王也。不兼舉二月、三月，而通之何歟？曰：《春秋》之義，固上貫二帝三王，而下治萬世者也，文王雖受命稱王，而于繫《易》，猶以庖犧，正乾五之位，而謙居三公，晉明夷，升三卦，言受祖得民而伐罪也。臨商正，言：改正朔也。夫文王道未洽于天下，而繫《易》以見憂患萬世之心。《春秋》象之，故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。故明《春秋》而後可與言《易》，《易》觀會通，以行典禮，而示人以易，《春秋》通三代之典禮，而示人以權。經世之志，非二聖，其熟能明之。

劉逢祿認為《易》觀會通，以教人行典禮。然而「通三統」主要的目的，在於《春秋》通三代之典禮，明聖人經世之志，更示人以「權」。所以「《春秋》之義，固上貫二帝三王，而下治萬世者也」，劉逢祿主要強調孔子編撰《春秋》是「為萬世而立法」，故曰：「經世之志，非二聖，其熟能明之」。

(三) 內外例第三

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對「內外例」的「見解」為：「《春秋》大一統也」。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「內外例第三」記：

釋曰：昔文王繫《易》，著君德于乾，二辭與五同，言以下而升上，以內而及外也。夫子贊之曰：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。閑邪存其誠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，有旨哉！慎言行、辨邪正，著誠去偽，皆所以自治也，由是以善世，則合內外之道也，至于德博而化，而君道成。《春秋》所謂大一統也，夫治亂之道，非可一言而盡，易變動不居，由一陰一陽而窮天地之變，同歸于乾元，用九以見天，則《春秋》推見至隱，舉內包外，以治纖芥之隱，亦歸于元，始正本以理萬事，故平天下，在誠意，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。《春秋》之化極，于凡有血氣之倫，神靈應而嘉祥，見深探其本，皆窮理盡性之所致，為治平者反身以存誠，強恕以求仁而已矣。

劉逢祿舉「文王繫《易》，著君德于乾」以說明「君德」在於「存其誠」的重要，方能德化天下，因此劉逢祿認為「乾卦」的「二辭與五同，言以下而升上，以內而及外也」，是乾下卦「二爻」與上卦「五爻」同位為「中」，正是「以下而升上，以內而及外」，乾上卦「九五爻」飛龍在天，與乾下卦「九二爻」猶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是有大德敦化，小德川流的互補作用，國君能「存其誠」則能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」，這種德化的要旨「皆所以自治

也，由是以善世，則合內外之道也，至于德博而化，而君道成」，這是「《春秋》推見至隱，舉內包外」的「大一統」精神。

(四) 時月日例第四

「時月日例第四」在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中獨佔一卷，是知「時月日例」在《春秋公羊經傳何氏解詁》中相當重要的凡例。四十七種「時月日例」的不同模式凡例，茲列舉於下，有：

「朝時例」、「內朝加錄文例」、「聘例時」、「會例時」、「微者盟例時」、「平例時」、「侵例時」、「伐例時」、「戰例時：偏戰日詐戰月」、「圍例時」、「入例時傷害多則月」、「滅例月」、「定哀減例日」、「潰例月」、「取邑例時」、「獻捷例時」、「救例時」、「天王葬例月」、「大國例卒日葬月（宋、晉、齊、蔡、衛、鄭）」、「小國始卒，卒月葬時，極於哀公卒日葬月（曹、許、莒、邾婁、滕）」、「補注：外大夫不卒，卒例月。不葬，葬例時」、「內女卒例日補注葬例月」、「內女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」、「夫人至例月」、「補注：夫人出會如外國例月」、「弑例日」、「世子弑例分內外」、「稱國以弑例時」、「外弑未踰年君例月」、「討賊例時」、「內殺大夫有罪不日無罪日」、「諸侯相執例時」、「執大夫例時」、「大國君奔例月小國例時」、「內大夫奔例無罪日有罪月」、「外大夫奔例時」、「大國篡例月小國時」、「復歸例皆時」、「即位不日」、「失禮鬼神例日」、「失禮宗廟例時」、「外城例月」、「變制例時」、「狩例時」、「蒐例時」、「求例時」、「外灾例時」。

劉逢祿在歸納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何休所注的四十七種凡例當中，又有「補注」者，也有例中再細分「大國」者、「小國」者之例者，是知「春秋義例」在何休《春秋公羊經傳何氏解詁》中所佔的份量與比例，是很重要的發凡。劉逢祿在歸納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「時月日例第四」的「見解」為：「《春秋》以日月相示，不待褒譏貶絕」。

「時月日例第四」是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重要釋解議題，劉逢祿在其「釋曰」說到：

故天不言，以三光四時，為言視，言相萬也。聖人不辨，以時月日，為辨視，辨相萬也。詳畧之，以理嫌疑。

劉逢祿以天不言以「三光四時」顯示「相萬」，聖人不直接給予判斷，而「以時月日，為辨視，辨相萬也」，藉著記載的「詳畧」，來釐清「嫌疑」。劉逢祿深怕說釋的還不夠詳盡，又特別再加「雙行小字」按語的舉例：

如：狩乃常事，不書。諱致天王，以正冬狩。桓四年以于郎，譏遠。卽以春正月，譏不時。則狩制定復于獲麟之春。去正月以改正制，三者皆以書狩而實非也。又如夷狄子弑父，書日。中國子弑父，不書日。許止加弑，仍書日，以別之之類。

劉逢祿認為《春秋》「時月日例」已可洞晰是非褒貶，「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，以禮樂相示，而感之者意變色動」。所以說「《春秋》不待褒譏貶絕，以日月相示，而學之者湛思省悟」，劉逢祿認為《春秋》的「時月日例」記載已蘊含褒譏貶絕的作用，故曰：「經世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勿辨，其言彌微，其旨彌顯」。聖人以「時月日例」來垂示教化，只議而無辨，所以話語很隱微，而旨意則彌顯，讓讀者能以「屬辭比事」來「辨惑崇德」才是最好的學習。

(五) 名例第五

劉逢祿歸納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而標舉「名例」，其主要目的在：「興禮義、正名分」。劉逢祿在「名例第五」的「釋曰」中說：

昔子路問為政。子曰：在正名。名不正則政事不成，禮樂不興，刑罰不中，然則辨名正分，莫著于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上刺王公，下譏卿大夫，而建士庶人，則爵等之數，尤所汲汲矣。

劉逢祿認為《春秋》的作用在於「別是非、定猶豫」，其目的在於「興禮樂、正名份」，其刺譏諷諭主要在於「辨名正分」。劉逢祿又引《公羊傳》說：「傳曰：德合元者稱皇。孔子曰：皇象元，逍遙術，無文字，德明謐，德合天者稱帝。河洛受瑞，可放仁義，合者稱王，符瑞應天下歸往」。劉逢祿認為有其名要合其份，所以德配造化者稱「皇」，德合天地者稱「帝」，劉逢祿更引：

董子云：遠者號尊而地小，近者號卑而地大，親疏之義也。故德侔天地者稱皇帝。天祐而子之，號稱天子。故聖王生則稱天子，崩遷則存為三王，絀滅則為五帝。下至附庸。絀為九皇，下極其為民，故雖絕地，廟位祝牲，猶列于郊，號宗于代（通岱）宗。

故曰：聲名魂魄施于虛，極壽無疆。此言唯王位在德元，而儀刑萬邦也。

董仲舒也認為「德侔天地者稱皇帝。天祐而子之，號稱天子」，都是重在名實相符，是以「聖王生則稱天子，崩遷則存為三王，紂滅則為五帝」，聖王能德侔天地，才能「儀刑萬邦」。這都是奉告世襲「君主」，要能有其名，需達其實。如此各安其位，各行其職。既不潛越，又得其正。劉逢祿亦詳細的說明「王官之等」其命數員額的分工守職，各掌其務的王官之制。能達到各盡所職，各安其務，則「夫是以天子嚮明，諸侯自為正，禮樂行于上；刑罰措于下，則正名之道得也」，是《春秋》書「名例」的真正旨意。

因此劉逢祿在「名例第五」中舉出，「右譏：內小惡九十，天王二十，諸侯二十三，凡乙百三十三條」的名實不正事例，以示《春秋》之教以「禮義正名」之旨趣。

所以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十卷三十章中，唯有於「名例第五」有兩處「釋曰」，以強調以「禮義正名」的重要。其另一「釋曰」亦言：

司馬遷述董生之言曰：《春秋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。主于辨是非，故長於治人，撥亂世，反之正。非唯禁暴討賊而已。亂之所生，唯禮可以已之。禮之失也，王侯降為徒隸，荊吳交主中國，所謂小雅盡廢，其禍如此。

劉逢祿引司馬遷述董仲舒所言「《春秋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」，《春秋》一書的宗旨，即是在「辨是非」以「復禮」，亦如《論語·衛靈公》篇，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」，以達「徙義以復禮」。因此劉逢祿發揮《孟子·離婁》篇云：「王者之跡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一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、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；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孔子曰：『其義，則丘竊取之矣』」，孟子認為王者的風範喪失後，詩教的功能也隨之而隕落，所以要以《春秋》史教方式才能「繼三代而治萬世」。因此劉逢祿「名例第五」又「釋曰」言：

夫大雅多刺厲王，而小雅盡刺幽王，何哉？曰「序不云乎，厲王無道，天下蕩蕩，無綱紀文章，而瞻卬，召旻二篇，獨言刺幽王大壞，以是知文武之大經大法，皆厲變更之。而大滅之者，幽也。其細節數目，幽復悉去之，而階之禍者，宣也。是謂三代之亡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，以繼三代而治萬世者也。

劉逢祿認為詩的教化作用喪失後，就失去了對君主的譏諷功能，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」，是用《春秋》史教「以繼三代而治萬世者也」。劉逢祿在「釋曰」中更引用很多例子，用以

說明「正名分」的重要。「釋曰」言：

凡皆所謂正內以率外也。是以子思子述《春秋》之化曰：聲名洋溢乎中國。施及蠻貊，凡有血氣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言乎大者，如三辰之建四時，小者如列宿之錯峙，而各有職也。

正是強調「正內以率外」無論是「大者，如三辰之建四時，小者如列宿之錯峙，而各有職也」，都能正己以律人，能各得其分，以達「興禮義、正名分」的《春秋》教化。

(六) 褒例第六

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「褒例」的「釋曰」認為：孔子在編撰《春秋》時，對史載列國卿大夫之賢能者都未記錄，如：衛甯俞、齊晏嬰、鄭公孫僑等人的事績當時具在，而《春秋》所以絕少概見，是由於「《春秋》垂法萬世，不屑屑于一人一事」，且諸賢者又無特殊絕異的行徑，可以「為世立教」者，因此只在與弟子論談中，分別由諸弟子記之而已。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釋解「褒例」的旨趣，在於「秉禮度義」以褒「義動天地，忠貫日月」者，其「釋曰」認為：

是以論王政，則曰：謹權量、審法度、修廢官，又曰：興滅國、繼絕世、舉逸民，六者行而王政立矣。《春秋》譏稅畝田賦，謹權量也。改制質文，審法度也。詳官制，修廢官也。嘉死位，興滅國也。明氏族，繼絕世也。褒賢良，舉逸民也。故王者之治，將欲養民興學，莫先建侯。進邾、宿，封滕、薛，明元功也。崇紀子，廣孝也。詳桓文，重牧伯也。宋襄功未逮而有志焉，貴志也。楚莊、秦穆雖賢，僅使之長，帥族類相與親諸華、漸王化，中國之政罔或干焉，辨內外也。將欲興滅繼絕，又莫先辨賢，義動天地，忠貫日月，誠沮金石，貪生惡死之世，未之或尚也。為表三人焉，曰：孔父、仇牧、荀息，苞桑社稷，柱石國家，權輕重之義，別尊親之倫，容悅事君之朝，莫之或究也。為表三人焉，曰祭仲、紀季、季友、修明仁義，敝屣千乘，忘身以紓難，顯功以揀過，頑懦鄙薄之俗，賴以不亡也。為表五人焉，曰：蔡季、吳札、衛叔武、曹喜時、邾叔術，貪夫高張，廉貞不名，舉世混濁，清士乃見，不滑于物，不撓其寧，其志可則其行可尊。古之逸民，今未見共匹也。為表一人焉，曰：公弟叔肸。

劉逢祿認為《春秋》是以「論王政」之「謹權量、審法度、修廢官、興滅國、繼絕世、舉逸

民」這六種重要的王政為基礎，王者欲治天下，重在養民興學，使「譏稅畝田賦以謹權量」、「改制質文以審法度」、「詳官制以修廢官」、「嘉死位以興滅國」、「明氏族以繼絕世」、「褒賢良以舉逸民」來廣德教化，再加以「賞善舉賢」、「分治建侯」，將「義動天地，忠貫日月，誠沮金石」者，表彰於世，以為萬民典範，則乃自治矣。劉逢祿感嘆治者未能「表彰世傑」，其曰：

嗚呼！智名勇功，後世所以開國承家者，其秉禮度義，則相與詬病，以為不祥，而《春秋》所貴乎持世，乃在此，不在彼。為上可以知取人；為下可以知勉學矣。今小民有罪則能以法治之，有善則不能賞，而爵祿所及，未必非有文無行之士，是以賢不肖混淆而無所懲勸。是宜修《春秋》，舉賢之制。而唐宋以來，試士之法，以次漸廢，則朝廷多伏節死義之臣，而閭巷多砥行立名之士，斯結人心、厚風俗、存紀綱之要道也。

劉逢祿認為《春秋》秉禮度義以持世，是「結人心、厚風俗、存紀綱之要道」，治者當舉賢選良，不使「賢不肖混淆而無所懲勸」，則國乃治矣。

(七) 譏例第七（以時月日見者，入彼例）

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其「譏例第七」，略舉以下所引數例，以見其旨趣。

隱五年，公觀魚于棠。

傳：譏遠也。曷為遠而觀魚，登來之也。美大之之辭也。

初獻六羽。

傳：譏始僭諸公也。

桓二年，取郕大鼎于宋。戊申，納于太廟。

傳：譏遂亂受賂，納于太廟，非禮也。

桓四年春，正月，公狩于郎。

傳：譏遠也。注：月者，譏不時也。

莊元年，築王姬之館于外。

傳：譏築之禮也。于外非禮也。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。

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「譏例第七」中，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。而其所引之條例，或《傳》或《注》皆已明言「譏」，其所「譏」者，大都是「非禮也」，是知「譏例」旨在「譏，違禮制」之事，「譏，非禮也」或是「譏，遠也」或是「譏，不時也」等之情況。

(八) 貶例第八

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其「貶例第八」，略舉以下所引數例，以見其旨趣。

隱二年，無駭帥師入極。

傳：不氏，貶，疾始滅也。

三年，尹氏卒。

傳：貶，譏世卿。註：不官不名。

莊元年，夫人孫于齊。

傳：不稱姜氏，貶，與弑公也。注：貶者見王法所當誅。

宣元年，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。

傳：不稱姜氏，貶，譏喪娶也。喪娶者公也。曷為貶夫人。內無貶於公之道，夫人與公一體也。

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其「貶例第八」中，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。而其所引之條例，或《傳》或《注》皆已明言「貶」，其所「貶」者，蓋為「貶，疾始滅也」、「貶，譏世卿」、「貶，與弑公也」、「貶，譏喪娶也」等，是知「貶例」旨在「貶，犯錯事」等之情況。

(九) 誅絕例第九

劉逢祿在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其「誅絕例第九」中，將「誅絕例」分為十六種「誅絕」的情況，如下：

「篡弑」，如：隱四年，戊申，衛州吁弑其君完。傳：以國氏當國也。注：與段同義。

「殺大夫」（世子母弟附，大夫相殺附），如：僖七年，鄭殺其大夫申侯。傳：稱國以殺君，殺大夫之辭也。

「伯討」，如：昭四年，楚子、蔡侯、陳侯、許男、頓子、胡子、沈子、淮夷伐吳。執齊慶封殺之。傳：為齊誅也。慶封走之吳。吳封之于防，不言伐防。不與諸侯專封也。慶封之罪何？脅齊君而亂齊國也。

「諸侯相殺」，如：桓六年，蔡人殺陳佗。傳：陳君也。謂之陳佗，絕也（註：國當絕），曷為絕之？淫乎蔡，蔡人殺之。注：從討賊辭。去爵者，起其見卑賤，猶律文，立子姦母，見乃得殺之也。

「王侯大夫奔叛」，如：成十有二年，周公出奔晉。傳：其言出，自其私土而出也。注：此起諸侯入為三公也，明當并絕其國。

昭元年，秦伯之弟鍼出奔晉。傳：仕諸晉也。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。故君子謂之出奔也。注：與逐之無異。

「逐大夫」，如：哀三年，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。注：稱人者，惡大夫驕蹇作威，相放當誅，故貶。

「納大夫」，如：宣十一年，楚子入陳，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。傳：此大夫也。言納，納公黨與也。注：據納謂已絕也。

「大夫專命」，如：襄十二年，季孫宿帥師救台，遂入運。傳：其言遂，公不得為政爾。

「滅獲」，如：僖二年，虞師、晉師滅夏陽。傳：虞，微國也。序乎大國之上，使虞首惡也。虞受賂，假滅國者道。以取亡焉。

「潰亡」，如：僖四年，蔡潰。傳：下叛上也。國曰潰，邑曰叛。

「失地君」，如：僖二十年，郕子來朝。傳：失地之君也，不名，兄弟辭也。注：不忍言其絕賤，明當尊遇之，異于鄧穀。

「復封」，如：昭十三年，蔡侯廬歸于蔡。陳侯吳歸于陳。傳：此滅國也。言歸，不與諸侯專封也。注：名者，專受其封當誅，所以能起楚封也。陳無君，無所責。蔡本以篡見殺，但不成其子，不絕其國，即諸侯存之，當有文實也。

「伐上」，如：宣元年，晉趙穿帥師侵柳。傳：天子之邑也。不繫乎周。不與伐天子也。注：絕正其義。使若兩國自相伐。

「叛上」，如：襄十六年，晉人執莒子、邾婁子以歸。注：錄以歸者，甚惡。晉有罪，無罪皆當歸京師，不得自治之。

「狄中國」，如：桓十五年，邾婁人、牟人、葛人來朝。傳：皆稱人，夷狄之也。注：桓公行惡而朝事之，三人為眾。足責，故夷狄之。

「吳楚王」，如：哀四年，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。傳：赤者何？戎曼子之名也。子北宮子曰：辟伯晉而京師楚也。注：使若晉非伯執，而赤微者，自歸于楚，主書者，惡晉背叛，當誅之。

劉逢祿在「誅絕例第九」的「釋曰」中，強調誅絕是除「擅權作亂」，將東周以後，王綱不振，君臣放弑，彝倫法制，數壞簡棄的弊病及惡果，詳加說明，以闡明《春秋》經傳及何休注解的要義。其言曰：

釋曰：貶絕者⁷。所以詰奸慝，除亂賊也。自王綱不振，小雅盡廢。彊大兼并，君臣放弑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勝數。極于中國微滅，吳楚狎主，而三代之彝倫法制，數壞簡棄，無復存者。蓋夏商之末，失以強；而周之末，失以弱；強則去之也，驟而湯武之反正也。亦易弱，則陵夷衰微，而天下之思治也，亦難厲幽之亡。不生孔子，天將以《春秋》之制，統三王而正萬世也。周之衰也，始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，而專封、專討，天子不能問也，繼則自大夫出，而擅作威福，君若贅旒。下至陪臣效尤，而卑隸輿臺，啟假威坐床之疊。外至四夷，垂便而文身、左衽，張僭號爭長之心。其在《周易》坤之初曰：履霜堅冰至，言微陽入而陰始凝，馴至其道，則无成而代有終也。夫子遂為之極，其義曰：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。于豐之言，妃主當國，夷主持世，則又微其詞。曰：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蝕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盛哉！扶陽抑陰之心，輔相天地之道，歷萬世而不可變也。

劉逢祿認為周朝之衰微，始於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」，因此而造成諸侯「專封、專討」

⁷ 「釋曰」中所謂：「貶絕者」，與目次及內文之題名「誅絕者」有異，當是劉逢祿或刊刻者之比誤。

的逾越行為，天子無權而不能問，繼而造成令出自大夫，大夫擅權作威作福，國君之存在猶如贅旒。這種僭禮越份的不尊風氣，致使各國陪臣競而效尤，而「卑隸輿臺」的地方官員，更是擅自作大，不尊彝倫法制。甚至外邦四夷，囂張僭號，而有逐鹿中原，以爭長短之心。

劉逢祿認為孔子眼見社會失序，認為：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」，這種脫序行為，是漸漸累積而成。孔子認為唯有能「辨是非」、「明善惡」方能止此歪風，因此作《春秋》以道「禮義」。其曰：

然猶以為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，于是受命制作，取百二十國之實書，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，上誅乎王而下及于庶人。內誅魯公而外及于吳楚。雖冒萬世之罪而不敢避，曰：備矣。夫醫者之治疾也，不攻其病之已然，而攻其受病之處。小雅盡廢，亂賊所以橫行也。《春秋》欲攘蠻荊，先正諸夏；欲正諸夏，先正京師；欲正士庶，先正大夫；欲正大夫，先正諸侯；欲正諸侯，先正天子。京師、天子之不可正，則託王於魯以正之。諸侯大夫之不可正，則託義于其賢者，以悉正之。曰：諸侯不死位者，絕其身，雖魯隱之賢，猶不得免于貶。況蔡獻舞、晉夷吾、齊無野之屬乎。曰：諸侯出奔者，絕其國，雖魯定之親，猶不得免于盜，況衛剽蔡東國之屬乎，曰：諸侯義不得專封。雖齊桓之存三亡，猶棄疾之封陳蔡也。曰：諸侯義不得專討。雖楚莊之殺微舒，猶靈王之戮招瑗也。曰：諸侯不得專地，以湯沐易朝宿，猶晉之侵柳園郊也。曰：卿不得憂諸侯，雖趙武，貶也。曰：大夫不得專廢置。雖卻缺，貶也。曰：大夫不得專執，雖韓不信，貶也。曰：大夫不敵君以戰，則貶得臣，而荀林父之亢顯矣。曰：君不會大夫，則貶趙盾，而楚嬰齊、齊世子光之驕蹇顯矣。曰：大夫不得專平，則貶子反，而淩梁之偏刺顯矣。曰：卿大夫不得世，而弑光立朝之萌見矣。曰：君親無將，則陳招之殺世子偃師、楚棄疾之殺公子比，猶弑君也。曰：大夫無遂事，則仲遂之弑赤，先見于如晉；隱如之逐君，先見于宿之入運也。曰：孝子之義宜衛疾，則許止之進藥，猶商臣、蔡般也。曰：大臣之義宜討賊，則趙盾之復國，猶甯喜、崔杼也。曰：人臣知賊而不言當誅，則叔孫得臣猶齊慶封也。曰：與于弑君者皆誅，則文姜可絕，而齊誅哀姜，不得讐也（蔡靈書葬，與哀姜書葬，同義）。曰：不能乎親者皆絕，則天王可廢，而衛討蒯聵乃為義也。曰：犯命盜國者誅而絕其後，則衛朔之篡明去葬，罪加于鄭與衍也（夷吾篡不明去葬）。曰：誅君之子不立，則楚旅之不得繼商臣，猶蔡有之不得繼般也。曰：殺世子母弟，罪加于專殺大夫，則鄭莊、宋平之刑當其罪，猶宜絕，而詭諸之不育則誅也。曰：滅同姓者，罪加于滅人，則魯衛之國

宜奪，而同與燬之身必誅也。曰：潰亡者不復興，則蔡肸之去葬宜絕。而梁與沈之失民同罪也。曰：背殯用師者貶，則鄭費、晉謹之奪爵，而周殺年夫，莒殺意恢之失親同罪也。曰：弑未踰年君與成君同。則里克、商人之罪著，而仲遂誅也。曰：弑弑君而立者，與成君同，則邴歇聞職且不得託于討賊，而棄疾篡也。曰：弑無道之君不得以國人為辭，則晉趙盾、楚比之罪定，而夷獯、楚虔，猶庶其、州蒲，密殯、薛比也。曰：立其所宜立，不得以反正為辭，則甯喜、陳乞之罪定，而衍與陽生，猶突與小白也。曰：誅其所當誅，不得以討賊為解，則里克、甯喜仍繫大夫，而翬、遂之稱公子，罪有主也。曰：討其所當討，不得以伯討為解，則滅陳、滅蔡先正其名，而陳招、蔡般之禍及其國，罪益著也。曰：立所不當立，不得以擁戴為名，則單劉、尹氏各挾幼主，首正其罪，而衛晉王猛子朝之，見挈于下，誅必及也。曰：大夫相放殺者誅，則王札子之罪正，而侯國稱人者悉誅也。曰：士殺大夫者比諸盜，則刑人不繫國，而主其國者，與有誅也。曰：滅人者眚之，雖齊桓之功不足除惡，況虞之受賂，莒之取後者乎。曰：執人者黜之，雖桓文之討罪，猶責以自省，況宋莊、楚成之懷詐者乎。曰：執諸侯宜歸天子治其罪，畀宋人不得已也，歸于楚則叛也。曰：執諸侯而釋于會者，坐專執，執以歸，無王也，築防血社尤惡也。曰：獲諸侯大夫者，坐專獲，殺陳佗義也，戕鄆子亂也。曰：殺大夫者，坐專殺，討樂盈義也，漏言于射姑亂也，誅譖臣可也，殺諫臣罪也。曰：大夫不以道去者絕，逐高克、罪鄭伯也，奔秦罪先昧也。曰：公子不得臣異國，衛蒯聩世子、秦鍼母弟尤悖也。曰：無君命不得稱兵，華元圍彭城正也（曼姑圍戚以靈公命，故得為伯討）。趙鞅清君側亂也。然則有誅無絕者，惟元功之臣（見桓十七年注），及聖人子孫（僖二十三年注），而國不除者顯矣。有絕無誅者，惟子于母為所生，雖輕于父而重于君，而誅得避者鮮矣（定四年注）。夫誅者，小則譴罰之，甚者加之五刑，又其甚者，焚棄之、辜磔之，先王之典也（注：稱梟首，斬要皆秦法，僖二十六年，宣八年，疏亦不的）。絕者輕則放流之，絕其身重者，諸侯則變置之。絕其子孫卿大夫，則絕其小宗。《春秋》之善善也長。惡惡也短，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所謂「禮義之大宗」也。

劉逢祿認為孔子受命制作《春秋》，取百二十國之寶書，自魯隱公元年起，「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，上誅乎王而下及于庶人。內誅魯公而外及于吳楚。雖冒萬世之罪而不敢避，曰：備矣」。《春秋》載明是非對錯，屬辭比事，寓於褒貶，以明倫常彝制之「禮義」，上貶天子下譏卿士，欲使倫常法紀歸於正。因此《春秋》寓意，欲攘蠻荊，必先端正諸夏；欲正諸

夏，必先端正京師；欲正士庶，必先端正大夫；欲正大夫，必先端正諸侯；欲正諸侯，必先端正天子。然而京師與天子不可要求他躬身端正，則託王於魯以作為端正的典範。諸侯大夫之不可正，則託義於其賢能者，以做為端正的借鏡。劉逢祿羅舉《春秋》中各種「誅絕例」，以說明《春秋》貶斥之所在，劉逢祿更提出如何分職守任的各種典範，以端正「親親」與「尊尊」的禮份。

四、結 語

戴望為劉逢祿寫《行狀》，稱：「先生進退中禮，言動皆有則望，其容止夷然、退然，嘗欲推舉古制，見諸行事，咸怪笑為迂，不以措意」⁸，儼然是經師人師的夫子風貌。劉逢祿力倡公羊學說，並非在政治理想與政治目的的推動，其所關注的在於恢復漢代的經今文《公羊》學術。

劉逢祿揚何休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中的「義例」要義，其對「託王於魯」是據有《春秋》當新王之意，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·誅絕例第九》云：

夫醫者之治疾也，不攻其病之已然，而攻其受病之處。小雅盡廢，亂賊所以橫行也。《春秋》欲攘蠻荊，先正諸夏；欲正諸夏，先正京師。欲正士庶，先正大夫；欲正大夫，先正諸侯；欲正諸侯，先正天子。京師、天子之不可正，則托王於魯以下之；諸侯、大夫之不可正，則托義於其賢者以悉正之。

魯國只是國君本不當為王，《春秋》卻把它視為「王」，不過《公羊》家是以魯國作為一個假想的王朝模型，以使各種禮法、制度、褒貶、誅絕能夠有所附著，劉逢祿的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在再次申敘此義云：「《魯史記》之例，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，《春秋》盡削之，其存什一於千百，以著微文刺譏，為萬世法，故曰非記事之書也。」

劉逢祿的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，大力闡發何休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，使之復蒙於清代，對於何休來講，劉逢祿不諱為第一功臣；劉逢祿不但對公羊學說，除了復原、提倡，他還建立了「經典釋義公羊化」新的思維。他在闡述公羊學說的時候，也是有一些時代的特點，劉逢祿論〈內外例〉云：

⁸ 見戴望《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》，《續碑傳集》卷七十二。

《春秋》推見至隱，舉內包外，以治緯芥之慝，亦歸於元始正本以理萬事。故平天下在誠意，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。《春秋》之化，極於凡有血氣之倫，神靈應而嘉祥見，深探其本，皆窮理盡性之所致，為治平者，反身以存誠、強恕以求仁而已矣。

從整體而言，劉逢祿對所涉及歷史上的一些政治問題時，都試圖以公羊學引入實際政治當中，以論議時事，他在討論封建制度與郡縣制度時，其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·侵伐戰圍入滅取邑例第二十五》云：

夫周之末失強侵弱，眾暴寡，士民塗炭，靡有定止。不思其所由失，而曰封建使然，於是悉廢而郡縣之，而天下卒以大壞。夫郡縣之法，勢不能重其權，久其任，如古諸侯也。一旦奸民流竄，盜賊蜂起，其殃民而禍及於國。秦漢之忽亡，晉季之紛擾，視三代之衰，則慘矣。夫王靈不振，九伐之法不修，則去封建而亂亡益迫；王靈振，九伐之法修，則建親賢而治道乃久。

劉逢祿認為秦朝之有天下，是因周朝末年的列國相互侵伐，使得生民塗炭，是「強侵弱，眾暴寡」攻戰不止所造成，才會弄的民不聊生，其「郊禘例」曰：「禮之不明，國乃滅亡，亂賊之禍，接跡天下，其以此也夫」。這豈是封建制度的關係，秦朝一統一天下之後竟貿然「悉廢」封建制度，而「郡縣」之，反使天下大壞。秦漢魏晉的衰敗在於「王靈不振，九伐之法不修」，其實這與封建制度或郡縣制度並無絕對關係，主要還是在於「建親賢而治道乃久」。劉逢祿的這種看法就是《公羊》家所主張的理念，劉逢祿運用在討論封建制度或郡縣制度上，實是《公羊》家經世濟民的關懷。

劉逢祿極力維護何休的「三科九旨」之說，其解說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也比何休更為清晰。其對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所釋「義例」都有具引「例證」與「見解」的闡明。本文探究劉逢祿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其「義例」之主要「見解」有：

於「張三世例一」則旨在：「『《春秋》緣禮義以致太平：於所見微其詞，於所聞痛其禍，於所傳聞殺其恩』，由是『辨內外之治，明王化之漸，施詳略之文』」。其「通三統例二」之旨有：「新周、故宋、魯當為新王」與「《春秋》為萬世立法」二個宗旨。其「內外例第三」則旨在：「《春秋》大一統也」。其「時月日例第四」則旨在：「《春秋》以日月相示，不待褒譏貶絕」。其「名例第五」則旨在：「興禮義、正名分」。其「褒例第六」則旨在：「秉禮度義」以褒「義動天地，忠貫日月」者。其「譏例第七」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。而其所「譏」者，則旨在：「譏，非禮」、「譏，遠也」、「譏，不時也」等，是知

「譏例」旨在「譏，違禮制」。其「貶例第八」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。而其所「貶」者，則旨在：「貶，疾始滅也」、「貶，譏世卿」、「貶，與弑公也」、「貶，譏喪娶也」等，是知「貶例」旨在「貶，犯錯事」等之情況。其「誅絕例第九」則旨在：誅絕「擅權作亂」。其「律意輕重例第十」則旨在：以「原心誅意，禁於未然」。其「王魯例第十一」則旨在：「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」。其「建始例第十二」則旨在：「受命改元」。其「不書例第十三」則旨在：「錄內而略外」。其「諱例第十四」則旨在：「為中國諱、為尊者諱、為親者諱、為賢者諱」。其「朝聘例第十五」則旨在：朝聘會遇盟平「防其微，謹始」。其「崩薨卒葬例第十六」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，則旨在：「天子曰崩，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祿」。其「十四諸侯終始表第十七、十八」文前以「余覽《春秋》」為開頭緒言，而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，則旨在：「以仁義一統中外，以張治法」。其「秦楚吳進黜表第十九」文前以「余覽《春秋》」為開頭緒言，而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，則旨在：「柔遠人、懷諸侯」。其「公終始例第二十」則旨在：「諸侯世子誓於天子。君薨命卿赴告，致國天子。天子命其宜立者為之後，踰年乃即吉行事。事畢，反喪服。所謂先君以正終；後君以正始也」。其「娶歸終始例第二十一」則旨在：「禮之本，造端乎夫婦，而察乎天地」。其「致公例第二十二」則旨在：「得意致會，不得意致伐」。其「公大夫世系表第二十三」文末並「無釋曰」之釋辭，則旨在：記「內大夫見春秋者四十七人」。其「內大夫卒例第二十四」（外大夫卒葬圻）則旨在：「大夫書卒者，君之股肱」。其「侵伐戰圍入滅取邑例第二十五」則旨在：「《春秋》無義戰，詳於言兵者，聖人將以禁暴誅亂」。其「地例之二十六」則旨在：「正封疆以建邦國，表山川以設險阻」。其「郊禘例第二十七」則旨在：「禮，禘祫從先君數，春祠，夏禘、秋嘗，冬烝」。其「闕疑例第二十八」則旨在：「義已空貫，則闕疑闕殆」。其「主書例第二十九」則旨在：「《春秋》無達辭，從辨從義，而一以奉人」。其「災異例第三十」則旨在：「畏天命。重民命」。

本研究之成果，除了可以洞悉劉逢祿遵循何休解經之方法要義，亦可得知常州公羊學派研治經今文學之承繼與發展的脈絡；及晚清公羊學者援經議政的基本理論依據。再者，藉由《公羊》「義例」的考察，亦可提供當代學者在從事晚清經學研究時，重新思考公羊學在晚清學術史上的影響與價值。